

語言擴散視角下的國際中文教育

陳崧霖

摘要

語言作為區域發展的文化標誌，對推廣和發揚文化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本文深入探討了語言、權力之間的相互關聯。首先，文中探討語言擴散和推廣的特點，並以歐洲語言和英語為例來分析此現象。文中聚焦分析了「台美倡議」和「孔子學院」，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的語言擴散，包括韓國「世宗大王學堂」和「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藉由各類數據輔助了解當前國際中文教育的機遇與挑戰，並揭示影響語言擴散的相關因素。最後，本文基於語言規劃提出了幾點建議。

關鍵詞：語言擴散 國際中文教育 全球化 台美倡議 孔子學院

陳崧霖，台灣成功大學中文系，聯絡電郵：z10708009@email.ncku.edu.tw。

本文曾在 2022 年第七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中報告，題為：語言傳播及語言規劃視角下的國際中文教育。後增益為期刊論文，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才能使本文更加完整。

一、前言——語言與權力

Ethnologue 2022 年統計世界上共有 7,168 種語言，以官話中文 (Mandarin Chinese) 為母語的人數大約有 9 億 2 千萬人且集中在亞洲地區。¹ 然而，如果考慮第二語言、第三語言，則英語擁有最多的使用者，主要是受到早期大英帝國殖民的影響，以及其後美國文化的擴散。² Goh & Lim (2010, 頁 14-33) 指出由於經濟強國中國的崛起，中文成為官方認可的標準語言，並通行於海外的僑民。隨着「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 (BRICs) 的經濟躍升，世界語言的生態正在經歷重大的重組，文中指出一種語言發展成為一種國際的交流媒介，需要有強大的權力基礎，無論是政治、軍事或經濟。縱觀人類歷史，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希臘語、拉丁語、中文和西班牙語等語言擴散到了歐洲、中東、日韓、越南及美洲，不同的歷史時期出於相同的原因：政治、軍事或母語人士的經濟實力。語言與權力之間的變化，使得中文也跟着成為語言學習者想要擁有的外語能力，全球學習中文的熱潮快速增溫且不斷擴散。³

國際中文教育發展的第一波機遇，是在 1978 年後實施的改革措施，尤其是受到中國經濟發展所帶動的各類產業。由上述的論述可知，語言始終無法純粹的服務於教育，而是有其文化目的與意圖，正如 Mayr (2008, 頁 1-26) 認為話語 (Discourse) 塑造制度 (Institutions)，而制度又創造和施加話語使之具有權力，這樣的制度環境可能出現在大學、媒體和軍隊，話語制度的權力需要被人們接受並合法化，同時具備合理性。為此，制度必需賦予話語或語言「展演力」(Endowed with the Performative Power) 以融入預期所達到的實現目標。⁴

1 王輝等 (2023) 9 月 25 日認為中文成為世界語言有六個轉向。參見 <https://reurl.cc/m0RrEY>

2 參見網址：<https://www.ethnologue.com/>。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一律都使用中文替代“Mandarin”。

3 據 Saudi Gazette 2023 年 8 月 22 日的新聞報導，沙烏地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教育部令全國公、私立中學每週兩節中文課。詳見 <https://saudigazette.com.sa/article/635154>

4 Mayr (2008, 頁 3) 認為語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知識的驅動，例如在工作場合中必須依靠話語呈現其展演力。

本文的寫作思路將聚焦討論近期「台美倡議」與「孔子學院」，所引起的國際中文教育擴散與推廣，從中討論機遇、構成，並輔以歐洲、亞洲其他國家的案例做為參照，希望能夠落實永續發展的國際中文教學。

二、語言擴散與全球化語言教育

(一) 語言擴散的驅動

語言擴散 (Language Spread) 屬於社會語言學中的議題。1987 年美國舉行了 Georgetown University Round Table 並在隔年出版了專書 “*Language Spread and Language Policy*” 收錄了 Peter H. Lowenberg、Joshua A. Fishman、Renee Kahane、Henry R. Kahane、Charles A. Ferguson、Robert L. Cooper 數十位語言學家對語言擴散的研究。

Fishman (1988, 頁 1-16) 認為提到語言擴散，就使人想到英語做為一種動態的輔助語言，特別是英語做為全球科技語言（兼具流行和先進）以及現代化背景下大多數的青年文化。西班牙語做為拉丁美洲的輔助語言；官話中文做為大陸非漢族的輔助語言。歷史上包含拉丁語、希臘語的擴散，許多語言都是語言擴散的例子（又如俄語在亞洲部分國家的流通、Swahili 在一些新興的英語國家）。這些語言擴散例子的共同點是：透過強大的語言使用情境，敞開語言大門提供更廣闊的視野，就此語言的擴散就越容易。

Stevens (1988, 頁 320-331) 認為語言教學有助於語言擴散，語言擴散也會影響語言教育。他認為英語使用者數量激增的原因有下列幾點：供需原則，即為某些特定目的使用英語，英語作為職業、行政或學術目的工具聯繫在一起；有效且便利的語言教學，即以需求為導向的 EFL/ESL 使更多人廣泛認知激勵了進一步的需求。

那麼哪些族群是待開發的語言使用者呢？Stevens (1988) 列舉了四類型態。首先，語言擴散的本質其實是人口的遷移。其次是國家語言規劃政策，因為教育和政策將會影響增減學習者數量。再來是非

語言族群的人們，例如：加拿大人或新加坡人從事太空科學或空中交通管制員，因為工作的性質，所以需要英語，其他像是空中交通管制、海上通訊、旅遊業、流行音樂、廣播電視、新聞媒體、電腦和人工智慧等領域。最後是示範作用，也就是被語言學習成功的前景所吸引的人，像是社會菁英的形象，將使公眾對語言學習持正向態度。

García (2010, 頁 398) 對語言擴散的定義是⁵：指採用特定的擴散方式，賦予特定的語言或多種語言並隨着時間的推移，使通訊溝通的比率增加，而通常語言與文化相互伴隨而擴散。文中把二十一世紀的語言擴散稱為「後現代階段」(The Postmodern Period)，語言之間並不是競爭關係，而是重新調整以適應環境，特別是在全球化與科學技術的推動下，說話者的角色將會導致語言擴散的同時，將自身的意圖和社交風格滲透入語言。García (2010, 頁 402) 藉由觀察阿拉伯語、希臘語與拉丁語的擴散，總結四個社會行為面向：軍事征服或外力、權威的時長與距離範圍、擴散地區的多語制與語言異質性、學習語言的實質激勵。

比較 Fishman (1988) 和 Strevens (1988)。前者論述語言擴散必然與外力的驅動有關，不論是科技、娛樂、文化，甚至是殖民、歷史因素等。都會影響選擇哪種語言擴散，語言接受度與認同感。後者論述則與內在驅動執行面有關，包含教材教學法、人口政策、形象媒介等，特別是 Strevens (1988) 兩個論點，正巧與當前國際中文教育待開發的領域有關，亦即專門用途中文教學 (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教學教法的改進與提升。García (2010) 則是提出了當前語言擴散，並不是競爭關係，而是調整與適應當前的世界趨勢與需求，和往昔以軍事、殖民的手段有所區別。

綜合來看，語言擴散的成功與否，和內、外驅動的因素有極大的關聯。下文將先略論歐洲語言及英語的擴散，接着再討論亞洲語言(中文、韓文及日文)的現況。

5 García (2010 : 398) 認為 language spread 也可以稱為 language diffusion 或 language expansion.

(二) 歐洲語言及英語的擴散

根據「歐盟」(European Union: EU) 資料顯示, 現今共有 24 種的官方語言, 呈現出文化、語言的多樣性。⁶ 自 2001 年 9 月 26 日起, 歐盟每年都會慶祝 “*The European Day of Languages*”, 其口號是 “*Talk to Me*” 鼓勵擁有七億人口的歐洲在任何年齡發現語言多樣性 (Diversity) 及複語制 (Plurilingualism)。⁷ 此外, 歐洲也是最早開始着手語言擴散工作的先行者。根據「歐洲聯盟國家文化研究所」(European Union National Institutes for Culture: EUNIC) 2020 年 5 月發佈的工作手冊顯示, 2019 年歐盟共有 36 個和語言文化相關的機構或文化外交部門, 並在 92 個國家成立 120 個分會, 並擁有 2,500 個正式和準成員分支機構, 開展語言文化擴散。⁸ 這些機構的共同使命是 “*Through culture, we create trust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eople of Europe and the wider world.*” (透過文化我們創立歐洲人民與世界廣泛的信任及理解)。根據 KEA European Affairs 2016 年歐洲文化委員會 (Research for Culture Committee-European cultural institutes abroad) 的研究報告, 最早成立語言文化擴散機構的是 1883 年法國 *Fondation des Alliances Françaises Paris* — Marc Cerdan; 其次依次是 1889 年成立義大利 *Società Dante Alighieri Rome* — Alessandro Masi; 1907 年法國 *Institut français Paris* — Pierre Buhler, 幾個知名的學院機構如英國 *British Council* 成立於 1934 年、德國 *Goethe-Institut* 成立於 1951 年、西班牙 *Instituto Cervantes* 成立於 1991 年、葡萄牙 *Instituto Camões* 成立於 1992 年, 以及最近 2013 年成立的荷蘭 *Dutch Culture*、馬爾他 *Arts Council Malta*。⁹ 歐盟的語言文化機構成立至今, 大多已經超過三十年以上, 因此足以做為「語言擴散」(Language Spread) 的最佳例證。

6 參見網址: https://european-union.europa.eu/principles-countries-history/languages_en

7 參見網址: <https://edl.ecml.at/>

8 資料參見: <https://eunicglobal.eu/brochure> 以及 <https://www.eunicglobal.eu/about>

9 資料參見: Research for CULT Committee –European Cultural Institutes Abroad

<https://www.cultureinexternalrelations.eu/2016/03/01/research-for-cult-committee-european-cultural-institutes-abroad/> 頁 36, Figure 2.

Crystal (2003, 頁 86-120)、Ferguson (2006, 頁 110-148) 以英語為例討論其擴散的起因和推動，指出英語之所以能擴散的首要原因是大英帝國勢力的崛起，也就是大量輸出語言使用者以及殖民化培養菁英份子學會英語，使其在經濟和社會上佔優勢。其次是二十世紀下半期美國不斷增長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影響，像是科學技術研究（尤其是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語取代了德語）、跨國公司以及金融治理。由英語的擴散可知語言拓展通常不是一個單純的發展過程，可能藉由社會、政治及經濟力量，伴隨語言的迅速發展。透過不同區域間的政策制訂、人才及教育的交流互動，才能達成非軍事、非外交干預語言擴散。如今在全球化呼聲的圍繞下，英語已成為通用語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 廣泛應用在商務交易、國際外交和網際網路。

藉由歐洲語言及英語的擴散啟示，國際中文教育的擴散也無法置身於全球化與語言教育之外。Block & Cameron (2002, 頁 1-10)、Block (2010, 頁 287-305) 指出全球化 “Globalization” (或 Globalisation) 對語言教育和教學的影響，大致有三個現象：(1) 語言經濟改變了語言學習的動機，並影響人們選擇學習哪種語言，這些都是出於語言商品化的結果；(2) 隨着新技術和媒體，語言學習也為全球市場帶來不同快速和即時的新產品；(3) 政治條件對語言教育的影響，尤其針對英語的「語言帝國主義」(Linguistic Imperialism) 發展。B. Kumaravadivelu (2008, 頁 29-47) 認為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語言教師才了解到教授文化的重要性，到了 1990 年代由於大量的移民、難民被迫遷徙，以及人們重新審視多元文化，使得全球化進一步被強化。像是 ACTFL 的 5C 和 CEFR 所強調的跨文化溝通意識，都隱含着藉由語言教育，才能在全球化的環境下建立人們對世界文化的認知以及再造自我認同。

綜合上面的討論，大抵勾勒出全球化與語言擴散的關係：做為一個全球公民，語言經濟帶動了語言教育的發展，並影響各國國際話語權和語言的政經地位，並隨着新技術和媒體的影響，縮短了國與國、人與人空間和時間的距離，進展中必需保有跨文化溝通意識，進而追

求理解、包容、分享與合作的信念。據此，本文的寫作動機即是在全球化與語言擴散的視點下，討論國際中文教育的機遇、構成與挑戰。

三、機遇與構成——亞洲現況

本節將簡述亞洲不同的語言機構，對於語言擴散、規劃發展及政策訊息互為參照，以期發揮國際中文教育更有價值的面向。

(一) 台美教育倡議與台灣書院¹⁰

由於政治形勢的變化，2020年12月2日美國在台協會華盛頓總部和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簽署了諒解備忘錄，其目的是推廣 TOCFL 考試。隔日12月3日又發佈了台美教育倡議（U.S. Taiwan Education Initiative：UTEI）旨在擴大中文和英語教學的交流機會。UTEI的內容涵蓋了美國所資助來台的中文課程，像是美國國家青年安全語言計劃（NSLI-Y）、關鍵語言獎學金計劃（CLS）、Fulbright Program 相關的獎學金，以及全球大使獎學金（TUSA Global Ambassador Scholarship Program）、台灣暑期密集語言課程（Taiwan Intensive Summer Language Program：TISLP）¹¹。其後，2021年2月8日再發佈了第一期補助大學校院推動台灣優華語計劃，至今第二、三期陸續執行中。主要是以校對校的合作方式進行六項合作任務，包含下列¹²：

- (1) 選送華語教學人員及交換華語 / 英語教學人員。
- (2) 設置「台灣優華語獎學金」，鼓勵美歐地區大學學生來台研習。
- (3) 積極推廣線上華語文教材與課程，並爭取美歐大學相關學分採認。
- (4) 合作辦理華語文能力測驗。

¹⁰ 為了行文方便，本文將原本的華語，一律替換為中文。

¹¹ 資料參見：<https://www.ait.org.tw/zhtw/u-s-taiwan-education-initiative-zh/>

¹² 詳細名單如下 <https://depart.moe.edu.tw/ed2500/News.aspx?n=8E6F0C08E17D8910&sms=7ED9DDBE126EEE48>

(5) 辦理外國華語文教師研習培訓團。

(6) 於美歐大學設置華語教學中心。

事實上，過去也有相似的機遇，像是台灣書院，廖箴（2011、2012）指出 2011 年 10 月 14 日台灣有關單位在美國紐約、洛杉磯和休士頓成立了台灣書院以及漢學書房，目的是運用資訊及數位科技，整合華語文教育和繁體字推廣，根據文中的數據顯示，2012 年 3 月已在全球 54 個國家設置 172 個聯絡點。該文總結認為台灣書院主要服務海外僑胞，應該朝向「小而美、小而精緻」的方式，並且台灣書院與孔子學院存在競、合的關係。其後，黃振宇（2014）比較了台灣書院與孔子學院兩個機構的差異，也提到了台灣書院面臨經費短缺、組織分散、規模有限的問題。而孔子學院則是官方色彩、文化差異、缺乏代表性的符號。文中認為這兩個組織其差異點在於：政治環境差距、經濟與文化差距。

如果借鑒上述歐洲語言及英語的擴散來看，經濟工具的目的加大了國際中文教育的推廣，目的是掌握世界話語權，並以跨文化溝通作為橋樑，進而推動各方實質的交流、互動。事實上不論是台灣書院或是孔子學院，都傾注了許多人力與資金做為國際中文教育擴散的籌碼，彼此都帶有厚實的背景，因此較難以做為優劣評價的基準。此外，由近期新聞可知（2021 年 3 月 15 日）題為“*UCLA Receives \$2 million from Taiwan to Deepen Exchange*”刊登在美國國會「東西方中心」（The East-West Center：EWC）網站。¹³ 內文指出通過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公室（TECO-LA）捐款 200 萬美元，以支持 UCLA 的兩門學術課程。

綜合看來，國際中文教育的業務主要還是設立相關課程、研究項目，以電影、電視、文學出版、文資、工藝等較為靜態的服務。有關單位應該要設定一套檢核機制，並建立淘汰及駐點的評估方案，才能有效集中資源開發並深入經營，像是駐點的開班數量、課程名稱、學習時數、成效評估、註冊人數、合作及支援、學習資源等，進而推動

¹³ 資料參見：<https://asiamattersforamerica.org/articles/ucla-receives-2-million-from-taiwan-to-deepen-exchange>

國際中文教育擴散的效度。

本文把台灣相關的國際中文教育推廣（研究、講座、計劃、課程等）訊息整理為表 1。可以看到從 2002 年開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就已經開始進行相關的研究計劃。一直到前述 2021 年 UCLA 獲得資金挹注，長期推動相關的學術課程。

表 1：海外國際中文教育執行國家及期限¹⁴

北美（美國、加拿大）16 所			
合作單位計劃內容	執行期限	合作單位計劃內容	執行期限
華盛頓大學台灣研究講座計劃「台灣和東亞電影與視覺文化」	2009/7/1~2012/6/30 2012/7/1~2017/6/30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台灣研究講座」	2020/7/1~2025/6/30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台灣研究講座計劃」	2009/9/1~2018/8/31	麥基爾大學「台灣研究卓越學院計劃」	2013/7/1~2016/6/30
卑詩大學「提升台灣研究計劃」	2009/9/1~2014/8/31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台灣研究計劃及訪問學者計劃」	2014/7/1~2019/6/30
亞伯達大學「台灣講座計劃」	2011/1/1~2016/12/31	愛荷華大學「透過藝術和人文的流，強化對台灣的了解」	2014/7/1~2015/6/30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台灣研究獎助計劃」	2011/1/1~2013/12/31	密西根州立大學「2014 年至 2019 年密州大與教育部台灣研究講座計劃」	2014/7/1~2019/6/30
多倫多大學「全球台灣研究計劃」	2011/1/1~2014/3/30	布朗大學「薈聚台灣：全球文化、科學及政治脈絡中的貿易、移民與歸屬」	2015/10/1~2018/9/30
渥太華大學「台灣研究講座」	2012/7/1~2015/6/30	聖湯瑪斯大學「台灣研究計劃」	2016/12/1~2019/8/31
**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1955 年起	「台灣研究」	** 史丹福大學 Walter H. Shorenstein 亞太研究中音「台灣民主與安全計劃」	2005 年起
歐洲 17 所			
合作單位計劃內容	執行期限	合作單位計劃內容	執行期限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台灣研究學程」	2002/10/1~2021/9/30	德國德國杜賓根大學歐洲當代台灣研究中心 CCKF-ERCCT 獎學金計劃	2014/10/1~2017/9/30

14 ** 代表網站公布之外的訊息。資料參見：<https://taiwanstudies.moe.edu.tw/Default>

[接上表]

柏林自由大學漢學所 台灣研究計劃	2007/1/1~2007/12/31	德國閱讀·體驗·了解台灣	2015/10/1~ 2018/9/30
羅馬第三大學「台灣 研究在義大利羅馬第 三大學」	2013/7/1~2016/6/30	劍橋大學中文教師計劃	2016/10/1~ 2019/9/30
維也納大學「台灣研 究中心」	2014/2/1~2018/9/30	奧地利茵斯布魯克大學台 灣研究計劃講座	2017/9/1~ 2020/8/31
** 比利時魯汶大學國 際關係及社會學院「台 灣研究講座」	2015 年起	** 斯洛文尼亞盧布爾雅那 大學亞洲研究系「台灣研 究中心」	2009 年起
** 英國諾丁漢大學 「台灣研究計劃」	2013 年起	** 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尼 學院	2013 年起
** 捷克布拉格查爾斯 大學文學院蔣經國基 金會國際漢學中心	1997 年起	** 德國波鴻魯爾大學文學 院「台灣研究室」	2019 年起
** 波蘭亞捷隆大學 「台灣研究中心」	2011 年起	** 英國中央蘭卡夏大學 「台灣研究」	2018 年起
** 捷克馬薩里克大學 「台灣研究工作坊」	2010 年起		
亞洲 5 所			
合作單位計劃內容	執行期限	合作單位計劃內容	執行期限
香港、台灣研究講座 計劃：聚焦台灣一 健康、和平、記憶 (2014-2017)	2014/8/1~2017/7/31	韓國外國語大學「台灣研 究講座計劃」	2015/9/1~ 2018/8/31
日本國立大阪大學「台 灣研究講座（台灣語 言文化課程發展計 劃）」	2015/4/1~2018/3/31	越南國家大學所屬河內人 文社會科學大學「台灣主 題研究」	2015/9/16~ 2018/9/15
** 日本早稻田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	2003 年起		
澳洲 1 所			
合作單位計劃內容	執行期限		
** 澳洲國立大學亞洲 及太平洋學院	2013 年起		

除了與學術單位合作外，還有十一所海外台灣教育中心分佈在印尼、越南、印度、菲律賓、印度、泰國、蒙古國¹⁵、日本。其功能是招

15 資料參見：https://www.fichet.org.tw/what_we_do/taiwan_education_center

募學生、就地開辦中文課程等。除此，相關單位也選送中文教師到海外任教，包含了大學如圖 1 和中小學如圖 2，尤其是東南亞國家對於中文教師的需求最大。

圖 1：2015 年 -2019 年補助選送中文教師人數一覽表（大學）（資料來源全球華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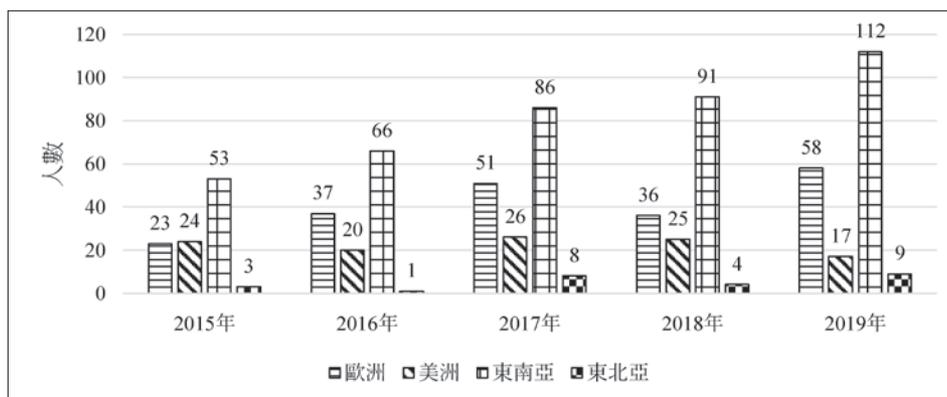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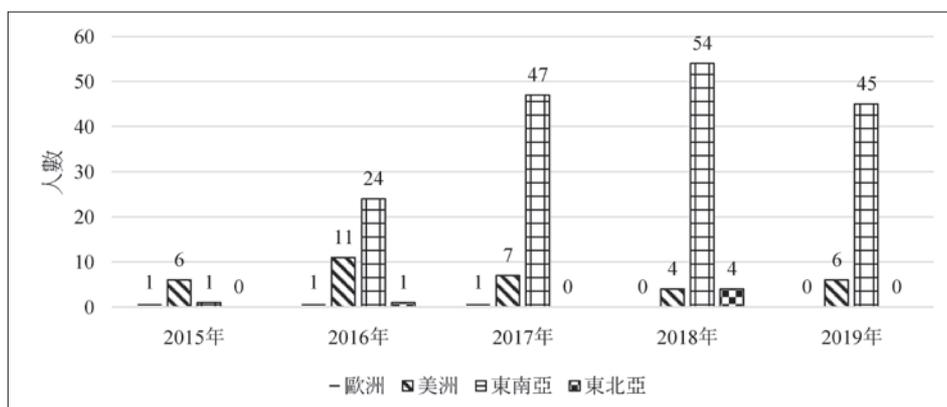


圖 2：2015 年 -2019 年補助選送中文教師人數一覽表（中小學）（資料來源全球華辦）



對照圖 1 和圖 2 來看，不論是大學還是中小學，東南亞地區對中文師資需求都是最高的，並逐漸上升。相較之下東北亞和歐洲很明顯的相對需求減少許多。

綜合上述的各方面資料和數據來看，從台美倡議、優華語計劃都

能看到各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與資源，傾注相關的資金，扶持國際中文教育及文化產業。然而實際投入與產出的價值，後續更應該受社會大眾檢視，特別是應該建立統整性的語言管理機構和研究院，了解區域教育政策、語言擴散與推廣，甚至結合資訊工程、經濟、外交、商貿、通訊等跨領域的專家，將教育部門、行政部門與非政府組織做整合規劃，措施與內容應該着重在實質、互利及永續。

(二) 孔子學院（語合中心）與「一帶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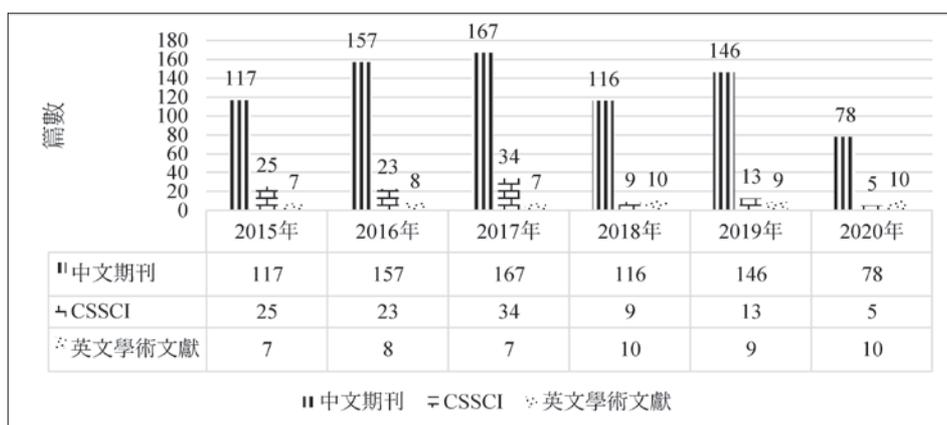
Gil (2017, 頁 21-43) 認為在當代世界政治體系中「軟實力」愈來愈重要，一個國家需要參與各種國際組織並獲得其他人的支持，像是政府間組織 (IGO)、非政府組織 (NGOs)、跨國公司 (MNCs)。中國軟實力的本質在於通過自身的實力，來實現世界中的目標，藉着強大的資源吸引、說服與其他參與者共同合作。

孔子學院（孔院）並非世界上唯一以人名列為語言文化機構的符碼，像是韓國的世宗大王學堂 (King Sejong Institute)、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學院 (Instituto Cervantes)、德國的歌德學院 (Goethe-Institut)、葡萄牙的卡蒙斯學院 (Instituto Camões)，都是使用世界知名的偉人做為媒介形象。吳應輝 (2013, 頁 4) 指出孔院隸屬於漢辦的漢語橋工程之下，共九個項目包括孔子學院、中美網路語言教學和多媒體製作、漢語教師隊伍建設、對外漢語教學基地建設、漢語水平考試、世界漢語大會、漢語橋比賽、援助國外中文圖書館。隨着時間推移，孔院的崛起與擴張不僅是歐美國家的焦點，也是世界各國所觀察的對象。

張東輝、鄭佳 (2021) 以文獻計量研究指出，截至 2020 年底全球已有 162 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 541 所孔院和 1,170 所孔子課堂。他們以 2015 年至 2020 年底為區間，檢索中文 CNKI 資料庫，並以「孔子學院」為關鍵字，得到了 781 篇文獻。英文則以 Springer, Science Direct, Taylor & Francis online, EBSCO, Wiley online library, Research Gate 為檢索資料庫，以“Confucius Institute”為關鍵字得到了共 51 篇文獻，詳見圖 3。

由這些數據顯示，不論是以中文或英文關鍵字搜尋，大多數的研究論文集在中文的閱讀市場，而中文文獻的研究議題涵蓋了，孔院在既有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定位願景、輿情評價、資源建設，探討較為宏觀的全球孔院的趨勢及普遍性問題。圖 3 明顯相較之下，英文文獻的研究資料就少得很多，可能也間接影響了西方社會對於國際中文教育推廣的精神與內容，進而產生了較大的認知挑戰。因此，國際中文教育的擴散，不僅是固定資產的投入，也需耕耘目標市場的研究與社會推廣，並發揮重要的學術影響力。

圖 3：2015-2020 年孔子學院中英文文獻數量對比



除了欠缺對英語讀者，論述國際中文教育的全面理解，加上政治情勢的鉅變，西方學者對孔院存有疑慮。Hartig (2016, 頁 16-31) 認為不可否認的孔院具有戰略目標，用來與外國公眾交流從而增強中國的軟實力，孔院的設置既受到政治和意識型態的關注，也受到許多實際問題的阻礙。Hubbert (2019, 頁 10-23) 從人類學、全球化與軟實力，討論了孔子學院在全球的狀況，他認為 2016 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所稱中國威脅 (China threat) 或中國威脅論 (China threat theory) 認為新的大國崛起，帶來了緊張和衝突。孔院之所以受到西方國家的質疑，主要是因為在全球化和現代性的期望中，尚未被西方所普遍接受。

李蓉 (2021, 頁 205-228) 則提出了解決之道，文中指出孔院對

於本土或海外都具有「陌生感」的「他者」，一般社會對孔院的認知都需要經由媒體才能深入了解「他者」的存在，因此策略上應該要消除其對孔院存在的模糊認知才能去蔽誤解。文中認為應該在一帶一路的背景下積極開拓孔院形象的傳播路徑、面向國內民眾消除其對孔院的誤解或模糊性、積極向海外民間機構宣介、掌握海外輿情預判與應對的主動性。

Li (2019, 頁 47-72) 以 “*Studies on Confucius Institute and Language Management*” 為題，也從文獻計量着手，藉由 CNKI 指出 2014 年是研究孔子學院的高峰，總數出版品數量達 515 篇，其中期刊文章 357 篇，107 篇研究生論文和 51 篇會議論文。他把 2005 年至 2017 年的共 3,658 篇文獻計量整理如下圖 4。

圖 4：2005-2017 年孔子學院中文文獻數量對比。(Li 2019, 頁 47-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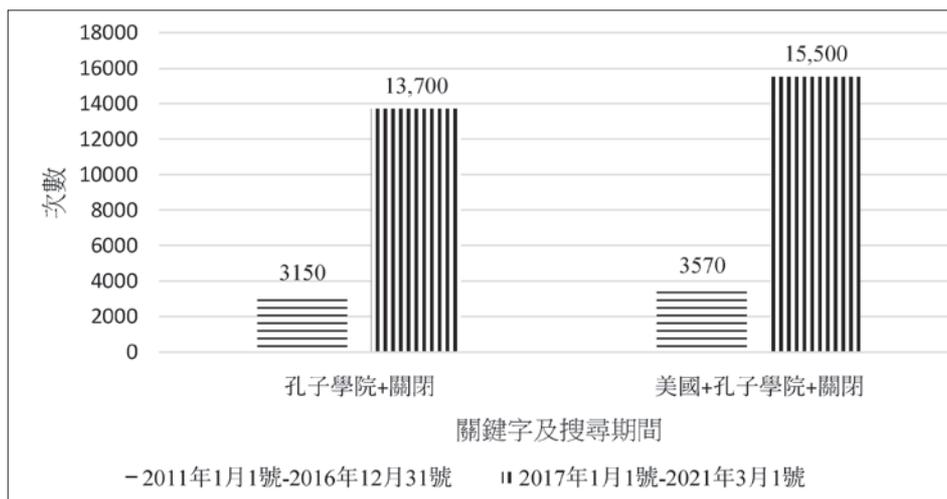
<i>Year</i>	<i>Journal Article</i>	<i>PG. Thesis</i>	<i>Conference Paper</i>	<i>Total</i>
2017	299	128	5	432
2016	300	127	8	435
2015	214	212	34	460
2014	357	107	51	515
2013	260	153	50	463
2012	286	70	82	438
2011	214	34	61	309
2010	147	15	48	210
2009	122	7	38	167
2008	78	7	11	96
2007	66	1	4	71
2006	41	1	3	45
2005	16	0	1	17
Total	2,400	862	396	3,658

這些研究的議題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部分：孔子學院的策略與永續發展、孔子學院在公共外交和軟實力中的作用、孔子學院的漢語教學。相較之下，對於語言政策的研究則比較少。Li (2019) 透過師生訪談、課堂觀察、管理者面談、問卷調查等方法，總結認為孔院的發展應該回歸到語言政策和規劃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 LPP) 和語言管理 (Language Management : LM) 的層面，由於全球化的結果，在日益多語言的社會中，LPP 不再只是決策者所關心的問題，同時也是基層人們所關注的目標，可透過他們的實踐來制定實際的政

策。從 LM 來看，應跨越漢辦、合作機構、當地孔子學院，最重要的是了解師生做為體現孔子學院教學，進行互動的做法。整理而言，從宏觀（國家）和微觀（個人）角度處理 LPP 的理論，了解靜態（策略、聲明）和動態（政策實施）的觀點。Li（2019）的研究與分析，不僅只是針對單一語言教學機構，也是對於當前整個國際中文教育擴散的指引建議。

語言擴散與推廣，必然涉及媒介形象問題、傳播學、政治學及國際關係。其次，也同樣涉及文化甚至教育思維的建構，特別是傳媒與媒介塑造也將影響着接收方、學習者的反應和認知。國際中文教育的擴散，亦是一種公共文化外交、國際關係的概念。本文以 2011 年至 2021 年這十年為區間並以 2017 年為分隔點，用關鍵字「（美國）+ 孔子學院 + 關閉」以高階搜尋 Google 繁體中文相關的網頁，可以發現如下圖 5 的趨勢分佈。

圖 5：2011-2021 年孔子學院在繁體中文 Google 網頁的數量趨勢



我們發現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後關鍵字「（美國）+ 孔子學院 + 關閉」的筆數不斷增加，顯示網路輿情關注到了「美國」、「關閉」孔子學院的狀況。2017 年是美國第 45 任總統川普（Donald John Trump）的任期（2017 年 1 月 20 日—2021 年 1 月 20 日），其政治立場代表美

國保守主義的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因此，圖 5 所呈現的數據變化必然有其政治與輿情關係。

吳應輝等（2019，頁 56）從全球孔院開班數量，觀察及分析了 2015 年至 2017 年孔院在各洲的開班數量（包含語言和文化課）做了統計（如圖 6），並提出四點建議，依序為重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孔院建設、建立孔院績效預算撥款及退出機制、訊息化及監督系統以及發展決策諮詢智庫。持平而論，對於國際中文教育的資源管理、監督、評估與決策，有其必要且必須形成評估系統。

圖 6：2015-2017 年孔子學院在全球辦學規模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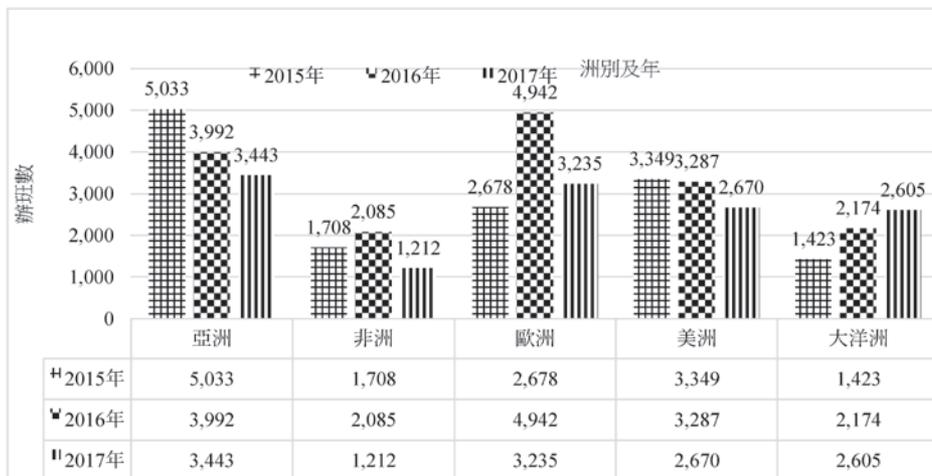


圖 6 的數據顯示自 2015 年至 2017 年全球孔院辦班數的總數由 2015 年 14,191 班爬升到 2016 年 16,480 班達到頂峰，再到 2017 年下滑至 12,074 班。亞洲歷年辦班數逐年遞減，非洲和歐洲則是歷經大起大落，美洲則是從 2015 年的 3,349 班到 2017 年 2,670 班劇減了將近 680 個班級，相較之下大洋洲則是遞增。

除了從中英文研究文獻、孔院全球開班課數，切入分析中國軟實力在世界的發展外，王輝、韓進拓（2021）根據規模和質量數據分析，將 2006 年至 2018 年孔院和孔子課堂的發展歷程分為三個階段：2006 年到 2010 年為規模擴大期、2011 年到 2013 年為質量猛增期、

2014 年到 2018 年為平穩發展期。文中以 2006 年至 2018 年全球孔院發展指標體系，測算了每項指標的最優值如下表 2：

表 2：全球孔院、孔子課堂發展指標最優體系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內容	最優值
全球孔院、 孔子課堂發 展指標體系	規模發展	分佈規模	設立孔院、孔子課堂的數量	194 所
		受眾規模	漢語學員和一般民眾	2018 年漢語學員 186 萬人次、一般名眾 1,515 萬人次
		教師規模	專兼職教師	2015 年 5 萬人次
	質量發展	師資本土化	本土教師培訓	2018 年 7.15 萬人次
		教學質量	師生比	2015 年 1 : 30
		辦學經費	中方投入	2009 年 0.0744%

2020 年 6 月 18 日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孔子學院也進入了轉型升級的新階段。孔子學院總部更名為「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語合中心）不再對外使用「國家漢辦」的名稱。此外語合中心並與 27 家高校、企業及社會組織聯合發起的民間公益組織「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正式成立，全面負責運行孔子學院品牌，以適應新形勢下國際中文教育事業的發展（王輝、韓進拓，2021）。袁玉芝、李清煜（2021）認為面對新時代孔院的發展路徑必需通過融入（對接本土化需求，尊重文化多樣性）、創新（呈現民間公益教育新形象）、持續性（着眼訴求制訂長期規劃）。

語合中心口號是“*Language is the best key to understanding a country*”並支援漢語橋、中文教師（TCSOL）、HSK、夥伴計劃、新漢學計劃、文化交流、學術研究等共十個項目。2021 年 3 月 24 日語合中心發佈了「國際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級標準」分為三等九級，涵蓋聽、說、讀、寫、譯五種語言能及跨文化溝通、任務內容、量化指標等，與過去 HSK 三等六級增加了翻譯及文化任務的標準。至於未來改頭換面的國際中文教育和 HSK 發展待更多研究與探討。

(三) 亞洲其他國際語言推廣機構 - 韓國、日本

考量國際中文教育的推廣，當前東南亞語言的擴散明顯不像中文、日語、韓語來得興盛。國際中文教育考試包含 TOCFL、HSK 考試。藉由這些措施做為入學、就業、考核人才的參考。鄰近的日本、韓國同樣也有相關的語言機構和政策，亦可做為國際中文教育推廣及擴散的參考。

大韓民國（韓國）於 2012 年 5 月 23 日修訂和頒佈《韓國語基本法》，同年 8 月 24 日正式實施，10 月 24 日根據《韓國語基本法》第 19（2）條正式成立「世宗大王學堂基金」（King Sejong Institute Foundation）¹⁶，旨在管理國外的韓國語教育和向外國人介紹韓國語言和文化的傳播。目的是滿足當前世界對韓國語言文化的需求，促進專業性品牌管理韓語教育，同時提升國家地位。並且也提供了兩種標準化的韓國語測驗考試 KLAT（Korean Language Ability Test）和 TOPIK（Test of Proficiency In Korean）。KLAT 是由 Korea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韓語學會）承辦，適用於想在韓國找工作者。¹⁷ 而 TOPIK 是由 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國立國際教育研究院）承辦，適用於想在韓國留學者，外國人必需獲得 TOPIK 6 級或更高級別才能申請教師執照，兩者都是初中高三等六級（L1~L6）。¹⁸

韓語的擴散同樣如前述各類語言教育機構，據「世宗大王學堂」的資料顯示，全球共有 244 家「世宗大王學堂」，其中美洲 32 所、亞洲 139 所、大洋洲 4 所、歐洲 57 所、非洲 12 所。¹⁹ 由此看來韓語穩佔於亞洲市場，未來更拓展至歐洲、美洲。根據 2021 年 04 月 15 日的數據，顯示自 2018 年到 2020 年「世宗大王學堂」的成長迅速我們整理如下表 3²⁰：

16 參見 <https://www.iksi.or.kr/lms/main/main.do>

17 參見 KLAT <http://www.kets.or.kr/eng/>

18 參見 TOPIK <http://www.niied.go.kr/eng/main.do>

19 大韓民國世宗大王學堂 <https://www.ksif.or.kr/ste/ksf/hkd/lochkd.do?menuNo=20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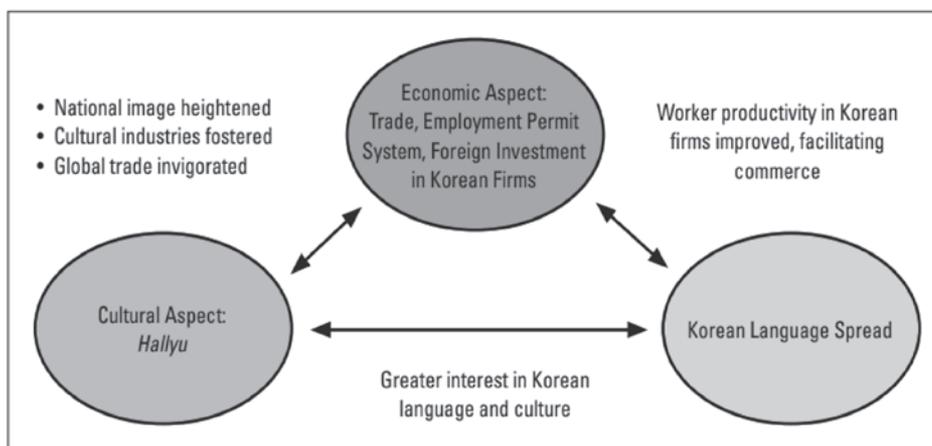
20 大韓民國世宗大王學堂 <https://reurl.cc/Do40b6>

表 3：韓國世宗大王學堂 2018 年 -2020 年 6 月數據資料

年 項 目	國 家 / 機 構 數	授 課 人 數	修 業 人 數	網 路 會 員 / 點 擊 次 數	文 化 交 流 活 動
2018 年	57/213	61,810 人	20,022 人	166,719 人 /926,295 次	30 處 /6,200 人
2019 年	60/180	72,713 人	21,457 人	200,916 人 /971,684 次	35 處 /12,625 人
2020 年	76/213	76,528 人	22,167 人	261,437 人 /1,672,544 次	實體 21 處 /6,200 人 網站 150 個 /12,082 人

表 3 可以看到為了因應 2020 年 Covid-19 的影響，世宗大王學堂增加了線上文化交流活動並獲得不少人數參加，而且網路遠距課程人數和點擊次數也激增許多。You & Ha (2018, 頁 258-294) 討論了韓語在中國、日本、哈薩克、澳洲、紐西蘭、美國的擴散。書中總結韓語之所以擴張迅速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於 1989 年設立世宗大王獎 (King Sejong Literacy Prize) 有關，1997 年韓國被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 (UNWTO) 登錄，2007 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一致批准將韓國納入專利合作條約。文中將韓語的國際擴散分為四期，其中 1980 年末至 2000 年中期拜全球化所賜，國際流動性熱絡傳遞了韓國流行文化 (韓流 Hallyu : Korean Wave)。2000 年代中期到 2010 年代中期以「世宗大王研究所」(世宗大王學堂) 項目，催化了韓語擴散的速率。文中把韓語擴散歸結三個面向，如圖 7：

圖 7：經濟、韓流和韓語擴散的相互作用協同效應



由圖 7 可見「韓流文化」和經濟層面協作產生，提升國家形象、培育文化產業、全球貿易活躍，經濟層面和韓語擴散產生，韓語的使用率、企業改善、促進商業，而韓語擴散和韓流文化產生，對韓語以及文化更感興趣。

我們使用了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MLA) 提供的數據庫觀察 1958 年秋天至 2016 年秋天，美國高等院校語言學習的註冊人數，以日語、韓語兩種語言為搜尋，語言註冊資料庫 (Language Enrollment Database) 最早可查詢年為 1958 秋天開始，最多年限區間可查詢八年，並同時選擇八種語言作為查詢對象。本文整理可如下圖 8 顯示的趨勢。²¹

21 資料參見：https://apps.mla.org/flsurvey_search

圖 8：1958 年 -2016 年 MLA 統計美國院校韓文、日文之註冊人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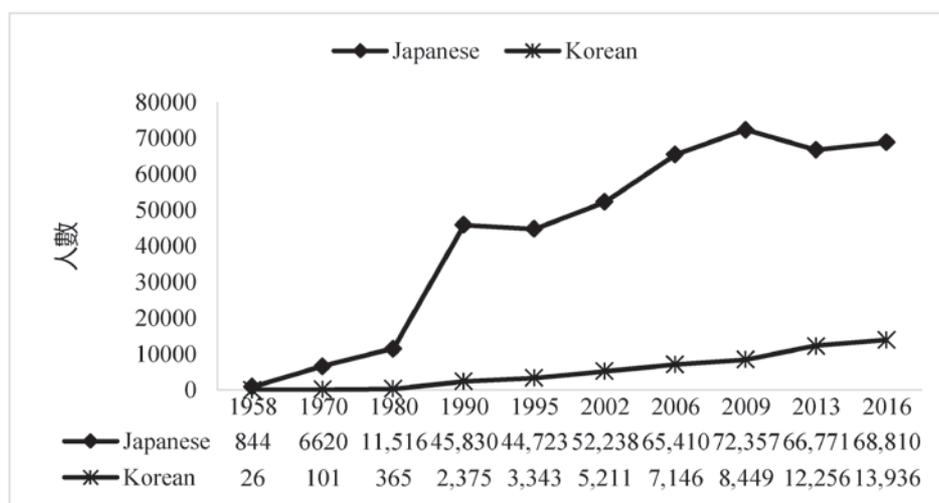


圖 8 所示 1990 年的韓語課程註冊人數為 2,375 人至 2016 年達 13,936 人，韓語對比日語的人數來說韓語的傳播與擴散，仍然有進步的空間。本文認為如果 MLA 所提供的數據無誤，那麼這期間（1990-2016）人數只相差 11,561 人數量其實不多，實際的情況還有待釐清。

除了「哈日」、「哈韓」的文化與觀光因素之外，科技發展也會對語言擴散帶來加乘效果，從 2020 年 Forbes 排名韓國五十大富豪排行榜中來看²²，電子產業、生物技術、線上服務、網路遊戲、汽車、化妝品佔據了大多數的排名位置。這些科學技術並不只滿足韓國國內需求，更是一種語言擴散的媒介，涉及了不同感官的接受，未來韓語的擴散發展可以做為長期觀察。

除了韓國，「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Japan Foundation）²³ 成立於 1972 年 10 月是由日本外務省監督的一個法人機構，2003 年 10 月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會以政府提供的 780 億日元資金為基礎，通過每年的政府補貼投資收入和私人的捐款來資助其活動。其成立的目的是通過文化、語言和對話增進日本與世界之間的友誼和聯繫，創造

22 資料參見：Forbes Media Korea's 50 Richest People 2021 RANKING
<https://www.forbes.com/korea-billionaires/list/#tab:overall>

23 資料參見：<https://www.jpf.go.jp/e/>

全球性的機會增進信任和相互理解。除此之外，自 1984 年開始辦理了「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語言測驗之一。

日語、韓語的擴散，不僅僅只是經濟、政治的優勢，同時藉由音樂文化、影視電影、美妝服飾、科技產品、餐飲食品、觀光旅遊等，各種軟性符碼包藏語言的影響力受眾層面相當廣泛，由此也促使反思國際中文教育的擴散，除了從行政、經濟着手之外，相關產業的推動亦能達到推波助瀾之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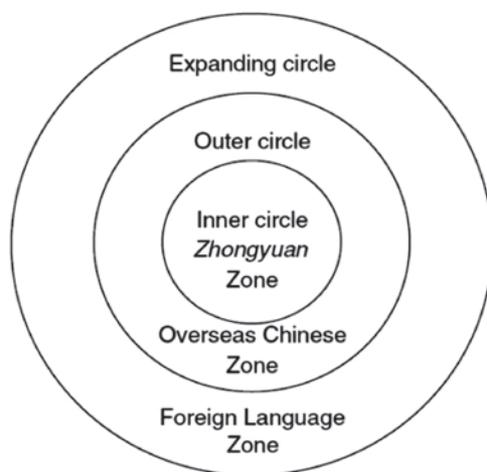
四、餘論與展望

本文以微觀的角度討論歐洲語言和英語擴散，兼論亞洲日本、韓國的語言現況，藉以輔助說明語言擴散下的國際中文教育。

正如第一、二節 Goh & Lim (2010)、García (2010) 所述，當代的語言擴散已是基於國際交流的目的，可能出於商業貿易、科學技術、教育或移民等需求，而非過去歷史上的軍事干預。Fishman (1988) 和 Strevens (1988) 給我們的啟示是，未來國際中文教育，也應分為通用中文 (General Chinese: GC) 和專門用途中文教學 (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 CSP)，一方面可以針對不同學習需求者有較高的實用性，另一方面也是培養菁英學習者起示範效應，例如：2021 年北京語言大學出版了數本「中國政府獎學金來華留學生考試大綱」，其中分為經貿漢語、理工漢語、基礎常用、文科漢語、醫學漢語，這樣的分類主要是符合廣大的留學市場。同時也應針對 CSP 和 GC 培養師資識別不同的教材與教法。其次，有鑒於韓國針對不同類型的學習對象、學習需求的考試 KLAT 和 TOPIK。不論是 TOCFL 或是 HSK 可將受測人員依據學習需求、目的分流，做為人才選擇的評估參考。

另一個重點是如 Strevens (1988) 所提及的，了解哪些是有待開發的語言使用者？可以參考 Goh & Lim (2010, 頁 17-18) 基於 Kachru (1985) 三個同心圓的模型來表示全球中文的內圈、外圈和擴展圈來說明，如圖 9：

圖 9：中文使用者的三個同心圓



內圈稱為「中原」，也就是指工作語言為中文的區域，第二圈則是將中文視為第二語言（CSL）的海外華人社區，像是泰國、菲律賓、緬甸等，中文通常都不是主要語言，而是做為家庭語言，中文教育可能設在非官方的補習學校，或是像馬來西亞由非官方的華人社團辦學、新加坡則由政府部門管理中文教育，新加坡是第二圈的重點代表，因為中文（華語）與英語、淡米爾語和馬來語並列，享有官方語言的地位。第三圈則是把中文當作外語（CFL）包括日本、韓國、北美、歐洲在教育機構把中文當作外語教學。例如美國的 National Flagship Language Initiative 以及 2006 年大學理事會成立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urse 等。

第三圈是衡量語言全球地位的標準，通常是由內圈的語言使用者投射的力量而決定。就如同第一、二節歐洲語言、英語的擴散一樣，具備外力的驅動。簡而言之，國際中文教育的擴散，除了強化內圈語言使用者的自信外，保有並維持第二圈現有的市場，進而影響並拓展第三圈。

再從第三節而論，不論是優華語還是語合中心，都應推動研究與教學的對外學術宣導，這樣可以彌補如圖 3、4 的文獻計量缺口，相關單位應該鼓勵、支持相關系所研究生、教授、外派教師投入國際中文

教育的研究，並從中獲取調查數據資料，做為語言規劃、語言管理參考的依據，才能穩定國際中文教育的發展，藉此提供國際社會一個透視、探究的窗口，減少因為訊息空缺而產生的誤解。對內而言，如前述關於 EUNIC、孔院或是日語、韓語等語言擴散和規劃文獻已經有較多的成果，像是每年出版的《孔子學院研究發展報告》，包含年度教學研究（教師與人才培養、教學資源）、發展研究（合作與支援、環境與體制、區域及國別研究）、輿情研究等面向，尤其是做為國家政策與策略計劃，這些研究調查報告，可做為國內決策分析，使人民知曉政府的具體措施與成效，藉以得到社會大眾支持。

此外，如 Li (2019) 所言，語言教育需要建立在 LPP 和 LM 的基礎上。本文認為特別是在兩個面向，首先是了解學科趨勢與因應學科發展：崔希亮 (2010) 指出過去「對外漢語教學」這個名稱是指在目的語環境對來華留學生進行的漢語教學，而用「漢語國際教育」是指在海外把漢語作為外語的教學。漢碩屬於專業型碩士（專碩）修業期限為兩年（其中課程學習一年，實習及畢業論文一年）學科歸屬為教育學類。專碩與學術型碩士（學碩）語言暨應用語言學修業三年不同。所以更應該考慮學科背景的差異，而有不同的培養方案及訓練養成。²⁴ 其次是師培學生的就業市場管理，除了在一般的語言中心、補習班任職外，現有眾多雙語、三語的國際學校，所以使師培生了解國際學校的教學課程與方法、教學管理，也是幫助其拓展專長，並提升就業能力的關鍵²⁵。

除了上述學科及師培的要求外，應該建立教師專業素養及品保：美國「國家專業教學標準委員會」（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NBPTS]）²⁶ 2016 年提出了五項“**What Teachers Should Know and Be Able to Do-The profession’s vision for accomplished teaching**”如下：

24 依照筆者的自身經驗，國際中文教育的師培生經常問：未來的出路是什麼？

25 這部分已經有學校設立 1B 師培課程，像是台灣師大華文所、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

26 資料參見 <http://accomplishedteacher.org/> “What Teachers Should Know and Be Able to Do”

- (1) 教師應是致力於學生和學生的學習。
- (2) 教師應了解教授的學科知識以及如何教學這些學科內容給學生們。
- (3) 教師負責管理和監督學生的學習。
- (4) 教師應系統性的思考自己的做法，並從中累積經驗學習。
- (5) 教師是學習社群的成員。

如果我們都同意把語言教學當作一門專業學科看待，教師必需熟知自己的專業學科外，並做反思性的決策，才能建立學科永續、人員永續、資源永續與擴散永續的願景。總結來說，本文做為略論分析當前國際中文教育的擴散與推廣，盼望能從機遇、構成與發展達成中文教學在國際語言教育領域中的一席之地。

參考文獻

- 崔希亮 (2010)：漢語國際教育三教問題的核心與基礎，《世界漢語教學》，1，73-81。
- 黃可 (2018)：文化全球化中的語言與文化推廣：法國文化協會、孔子學院與台灣書院對比研究，輔仁大學法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黃振宇 (2014)：兩岸推動中華文化政策國際化比較研究：孔子學院與台灣書院之比較，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論文。
- 李蓉 (2021)：《孔子學院媒介形象研究》，浙江，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
- 廖箴 (2011)：打造全球化的漢學研究平台——台灣書院「漢學書房」介紹，《漢學研究通訊》，30 (4)，47-51。
- 廖箴 (2012)：兩岸海外漢學推廣的競與合：以「孔子學院」及「台灣書院」為例，《國家圖書館館刊》，2，113-138。
- 王輝、韓進拓 (2021)：全球孔子學院發展指數構建，《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2，1-9。
- 吳應輝 (2013)：《漢語國際傳播研究理論與方法》，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吳應輝、曾小燕、袁萍 (2019)：《漢語國際教育發展報告 (2015-201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袁玉芝、李清煜 (2021)：融入、創新、發展：新時代孔子學院發展的困境與出路，《人民大學教育學刊》，1，170-180。
- 張東輝、鄭佳 (2021)：孔子學院海內外鏡像之比較——基於 2015-2020 年間的孔子學院中英文文獻述評，《人民大學教育學刊》，1，151-169。
- Block, D., & Cameron, D. (2002). *Globalization and language teaching*. Routledge.
- Block, D. (2010). Globalization and Language Teaching. In Coupland, N.,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1st ed.), 287-304, Wiley-Blackwell.
- Crystal, D. (2003).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rguson, G. (2006). *Language Planning and Educa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Fishman, J. A. (1988). Language spread and language policy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 In P. H. Lowenberg (Ed.), *Language Spread and Language Policy: Issues, Implications, and Case Studies*, 1-15,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García, O. (2010). *Language spread and its study in the 21st century*. In R. Kaplan (Ed.), *Oxford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Rev. 2nd ed.), 398-41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l, Jeffery. (2017). *Soft Power and the Worldwide Promo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Project*. Multilingual Matters.
- Goh, Yeng Seng & Lim, Seok Lai. (2010). Global Mandarin. In Vaish, V. (Ed.), *Globalization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Asia: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Processes on Language*, 14-33, Continuum.
- Hartig, F. (2016). *Chinese public diplomacy: the ris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Routledge
- Hubbert, J. (2019). *China in the World: An Anthropology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Soft Power, and Globaliz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Kumaravadivelu, B. (2008).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nd language educ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i, Ming fang. (2019). *Language Management and Its Impact: Th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Routledge
- Mayr, A. (2008). *Language and power: An introduction to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Continuum.
- Stevens, P. (1988). Language teaching contributes to and is influenced by the spread of languages. In P. H. Lowenberg (Ed.), *Language Spread and Language Policy: Issues, Implications, and Case Studies*, 320-331,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You, C., & Ha, Y. (2018). *The spread of the Korean language: Through the Korean diaspora and beyond*.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To Discuss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Spread

CHEN, Sung-lin

Abstract

Language is pivotal in spreading and promoting culture as a cultural symbol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making it inseparable from the globalized environment.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interconnected realms of language, power, and policy. Initially, we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spread and promotion, using European languages and English as examples to analyze this phenomenon. The paper focuses on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U.S.-Taiwan Education Initiative' and 'Confucius Institutes,' as well as language spread in other Asian countries, including 'Sejong hakdang' and the 'Japan Foundation.' the paper substantiates language spreading discussion with relevant data to unravel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language spread. In conclusion, the paper offers suggestions for fostering sustainable language spreading and promoting development.

Keywords: Language Spread,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U.S.-Taiwan Education Initiative, Confucius Institutes